

【论 文】

抗战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扩张渗透与“三区革命”¹

王欣登²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新（疆）关系与发生在这一时期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斗争（后称“三区革命”），在新疆现代史的苏新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其评价问题，学术界有为数不少的人，对现行新疆史著及学校教材的定论持有异议，笔者亦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即“三股势力”）不断制造事端，成为危害新疆社会的最大祸端。2002年元旦，竟然有人在新疆人民大会堂当众朗诵鼓吹民族分裂的反动诗歌。有鉴于此，自治区党委决定首先在文化教育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笔者年过六旬，作为一名专职历史教师，认为有责任打破沉默，重评苏新关系和“三区革命”，还历史真面目，以利于正确认识新疆历史和对年轻一代的反分裂教育，此为本文的目的。

一、

重评苏新关系与“三区革命”，首先必须从全局来审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苏关系。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分别于1919年7月25日，1920年9月27日，1923年9月4日，三次发表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夺中国的一切领土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取消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特别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政府明确宣布凡是沙俄“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但是，列宁逝世后，所有这些美好的宣言，都变成了一纸空文。斯大林不仅继承了老沙皇的侵略成果，而且在肢解、霸占中国领土方面，比老沙皇走得更远。

沙俄乘中国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古独立，并霸占外蒙古西北我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土地。1918年中国政府恢复了对外蒙古的主权，并声明唐努乌梁海主权属于中国。苏联继承了老沙皇政策，又一次策动了外蒙古的独立，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1931年，日本制造“9·18”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苏联却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于1933年5月，向日本建议出售中东铁路，1933年6月至1935年3月苏联与“满洲国”经过长期谈判，把沙俄侵略中国的遗产廉价（1亿4千万日元）卖给“满洲国”，取媚于日本帝国主义。当德国希特勒法西斯肆虐欧洲的时候，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却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希特勒一道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小国，北攻芬兰，南占罗马尼亚大量领土。从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苏联为建立“东方战线”，把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三百到四百公里，侵占了约37万平方公里土地、两千多万人口的地区。苏联在西部横行霸道的同时，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个条约意味着苏联正式承认“满洲国”，正式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以换取日本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正式承认苏联肢解中国的合法性。苏联在策划外蒙古独立的同时，又将强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正式并入苏

¹ 《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487(2003)01-0027-06。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article_201001204459.html

² 作者简介：王欣登（1937-），浙江浦江人，伊犁教育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联，并于 1944 年成立“图瓦共和国”。在全世界人民饱受德国法西斯灾难的时候，斯大林仍沉迷于同恶魔的“蜜月”幻想中，以致于不少国家把“希特勒即将大规模进攻苏联”的情报好意相告时，竟斥之为“挑拨”，仍不做战守应对措施。当希特勒发动疾风暴雨般的突然袭击时，无备的苏军一溃千里，损失惨重。自私而愚蠢的斯大林外交宣告破产。实际上，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北进”计划，德日东西夹击苏联的阴谋破产，苏联才能从远东抽调大量武器装备和军队，支撑西部危局。因此，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战斗，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

其次，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时，为促使苏联出兵打击日本关东军，在 1945 年 2 月 11 日苏美英三巨头雅尔塔会议上，因对日本本土尚存的军事力量估计过高，美英首脑满足了斯大林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条件：“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二、由日本 1904 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的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1. 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2. 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3. 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大国之间背着中国搞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说明中国人民仍未摆脱任人宰割的地位。同年 6 月，美国将秘密协定内容转告蒋介石。6 月 30 日，宋子文等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蒋介石指示可以“允外蒙古战后独立”，但苏方必须承认“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对中共及新疆‘变乱’不再作任何支援”。斯大林表示：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无论延安、新疆均将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8 月 13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政府则表示：“关于新疆最近之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而当时苏联指挥官，正在新疆境内指挥军队把战火燃烧到整个苏新边境地区。

历史惊人地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满以为可以收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帝国主义把持的巴黎分赃会议，却听任日本侵吞。愤怒的中国人民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苏联却提出更为严重的侵略要求，苦斗了八年的中国人民还没有尝到胜利果实，领土和主权受到更严重的损害，中国人民却被蒙在鼓里。直到 1946 年 2 月 11 日，雅尔塔会议一周年，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才披露，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当时，疯狂抢掠敌伪财产的苏联军队，却仍赖在东北。

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沙俄总是乘人之危，以武力相威胁，花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侵略权益，先后割占我国东北和西北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精通沙俄侵略之道，肢解、吞并中国领土达 170 多万平方公里，比老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世界史还是中国史著作中，对苏联的侵略罪行，竟然无一字记载。中国领土的地图本似优美的海棠叶，而今成为马鞍形。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领土危害最大的是日本和俄国-苏联，经过八年抗战，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除钓鱼岛尚存争议，已经收复；而俄国-苏联割占、肢解、吞并的中国 3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则永无归期了，那是相当于中国现有国土的三分之一啊！如今，“台独”、“藏独”、“蒙独”和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都一直在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中国史学界的同仁，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利益上看待中苏关系了！

二、

苏联同新疆有两千多公里的边界线，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疆不少民族同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些民族，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有的民族跨界而居，联系密切；有的民族

本自苏联迁入，关系更非一般。二十世纪起，影响新疆政局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苏联中亚地区，也危害非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德意日法西斯登台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向内蒙、华北推进，威胁苏联远东地区安全。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下台，出现了盛世才、马仲英、张培元三方争夺新疆军政大权的激烈斗争。苏联一方面背着新疆军政当局，秘密恢复留居新疆的白俄军人、商人的国籍，从而出现了一批“苏籍侨民”；另一方面，在盛、马、张三人中物色主政新疆的合适人选。苏联认为：马仲英同日本有联系（盛世才诬称他是日本走狗），如果得势，从东北到新疆将是日本势力范围，使苏联从远东到中亚直接受到威胁；张培元为国民党看重，但无亲苏表现，不被苏联看中；盛世才一再派人去莫斯科要求苏联支持，并表示自己信仰马列主义，如能得到苏联援助，将来可在新疆实行共产主义。况且盛世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合法政府首脑，因此，苏联决定插手新疆政局，全面支持盛世才。

1933年底，当盛世才与马仲英、张培元厮杀的紧急时刻，应盛世才要求，一支苏联红军从霍尔果斯入境，换上中国军装，对外称“塔尔巴哈台军”，炸毁惠远城南北两座军火库和城门，捣毁张培元的大本营，逮捕各级官员。张培元突遭东西夹击，败走铁板沟，在狂风大雪中绝望，自杀身亡。另一支苏联红军从巴克图卡入境，到达塔城，换上中国军装，对外称“阿尔泰军”，长驱到达迪化，突然开炮轰击进攻迪化的马仲英军，马败走南疆。当时南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马仲英部回民，虽信仰伊斯兰教，但反对分裂祖国。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消灭了这个分裂政权，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从此仇视回族。

马仲英部继续向喀什方向撤退，盛世才军在苏联两个骑兵团协助下，打败马仲英主力，马仲英交出军权，流亡苏联，不知所终。盛世才掌握了新疆军政大权。

1937年，南疆再次发生战乱，盛世才再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出动以康斯坦丁诺夫为总指挥、夏克尔为团长的机械化部队一个团，在40架飞机、20辆坦克配合下，从吐鲁嘎尔特山口入境，与原驻乌恰的两个骑兵团会合，彻底消灭了作乱武装。苏军大部回国，一部分被改编，分驻疏附、和阗及中印边境之赛图拉、黑黑孜江干等地。1938年，配有飞机、坦克的机械化加强旅“红八团”入驻哈密。苏军控制了南疆东西大门。如果说，西南边境驻军是防止西方势力渗透的话，那么在哈密驻扎重兵，便是保卫盛世才的割据政权。一个国家未经邻国中央政府许可，屡次出兵到邻国境内作战，又长期驻军其地，从国际关系上审视，是严重的非法的军事入侵。

盛世才依靠苏联军事力量，削平政敌，坐稳“边防督办”宝座，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当上了“新疆王”。他打出了反帝、亲苏的旗号，实行“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苏联便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援助盛世才。派阿布列索夫为驻迪化公使衔总领事，大量的苏联专家、顾问、教官、医生和联共党员来新疆工作。苏联专家帮助盛世才整顿财政金融，发展农业、工业、畜牧业、交通运输，整编军队，建立军事学校和文化教育宣传通讯事业。例如：苏联专家帮助制订新疆第一个三年计划（1937-1939）和第二个三年计划（1939-1942）；苏联提供了发展新疆生产建设的两次借款：1935年5月，借款500万金卢布，以本省土产核价抵还；1937年1月，借款250万金卢布。由苏联专家设计总长1,859公里的迪伊、迪哈公路，1935年春动工，1937年7月1日正式完工通车，一周后抗日战争爆发，成为重要国际交通线。因盛世才支持抗日战争，亲苏联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迪化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应邀来新疆讲学、工作。据说盛世才几次向斯大林提出要加入共产党，愿意把新疆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因为他知道，没有强有力的后台，他这个“新疆王”是做不成的。斯大林很满意，也很信任他。1937-1938年，盛世才制造第一起“阴

谋暴动案”时，诬称苏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是“托洛茨基匪徒”，阿布列索夫被送回苏联，在肃反中竟被判处死刑。

到了 40 年代，国际风云骤变，希特勒德国突然袭击苏联，盛世才感到苏联不可靠，转而投靠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取得国民党信任，政治上转向反苏反共。对在新疆的中共党员由限制到软禁、逮捕，并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领导人，作为晋身之阶；同时，又以向中央呈报为名，迫使苏联撤出驻扎在新疆的军队、地质考察人员，迪化及各地的专家、顾问、教官、医生也于 1943 年 5、6 月间陆续回国，各种军事装备、机器运回。迪化飞机修配厂、独山子油矿的油井、房屋、设备，苏军在哈密营房，由中国方面出资购买。苏新贸易中断，苏联第一次插手新疆政局以失败告终。

盛世才作为一个政客，其个人品格虽然一无可取，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是应该辩证地加以分析。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新疆省政府同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没有变，作为中国一个省的地位没有变；“保持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是盛世才的施政内容。他坚决打击民族分裂活动，清除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他提出并实行的“六大政策”，符合新疆各族人民利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新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明显发展；他支持抗日战争，新疆各族人民为支援抗日，捐献了大量财物，购买了十架战斗机，表现了很高的爱国热情；新疆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可靠而稳定的后方，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交通线始终是畅通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期间，传播了革命思想，对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留下了深刻影响。其次，盛世才对新疆政局的控制是没有疑问的，否则他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阴谋暴动案”，滥杀无辜，连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也不能幸免。当盛世才终于投靠中央政府时，非法驻扎新疆的数量可观的苏联军队、专家、顾问等各类人员，全部含羞忍辱，限令回国，几乎看不到他们反抗的记载。

从 1912 年杨增新主政新疆，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政府，都是经中央政府任命的合法的地方政府。这三十三年中，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没有同内地融成一体，也没有向中央领过一分钱。现在，终于经盛世才之手，把占祖国领土 1/6 的新疆，完整无损地交给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蒋介石称之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盛世才由反帝、亲苏、联共，到反苏、反共，从政治上来说是倒退，是反动；盛世才由依仗外国势力，当半割据状态的“新疆王”，到驱除外国势力，放弃地方割据，服从中央统一领导，从民族大业来看，是维护国家统一，是进步。因此，盛世才这个有很大消极面的人物，也有值得肯定的积极面。

三、

苏联军队和各类人员被迫从新疆撤离，苏联当局恼羞成怒，转而采取一系列罪恶的阴谋活动。

（一）制造分裂中国的舆论

曾任盛世才政府顾问的满素尔·肉孜耶夫（苏共党员，维吾尔族）炮制宣传品，称中国的边界是长城，新疆是清朝新夺取的疆土，鼓吹“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用维、哈文印刷，走私入境。

（二）拉拢艾力汗·吐烈

艾力汗·吐烈，乌孜别克族，原为苏联安集延大阿訇，因鼓吹泛伊斯兰主义，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1929 年定居伊宁，1937 年被盛世才逮捕，1941 年出狱，任伊宁白都拉清真寺大阿訇。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鼓动下，他放肆地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反汉排汉，反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歪曲新疆历史，煽动分裂、独立。

（三）设立军事基地，培训骨干

在阿拉木图、安集延、塔什干等地设训练基地，对新疆在苏学习和逃苏人员，进行军事训练，

作为武装斗争的骨干。

（四）建立秘密组织，准备武装暴动

伊犁、塔城、阿山、南疆分别进行。

1944年4月，在苏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帮助下，“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主席艾力汗·吐烈，成员大多数是宗教上层人士、富商、大地主、牧主，有个别进步青年。他们把白都拉清真寺作为活动据点，在封建上层、宗教人士中进行秘密串连。

1943年12月，在外蒙古的支持下，乌斯满在布尔根河成立“阿尔泰哈族复兴委员会”，自任“帕夏”（王），提出禁止汉人居住阿山，禁止汉族军队驻扎阿山等项主张。1944年4月上旬，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潜入青河会见乌斯满，派来一批军事顾问，供应武器、弹药。

1944年5月，在苏驻塔城领事馆的帮助下，塔城成立了几个秘密组织（“战斗小组”）。6月，肉孜耶夫在苏联境内的巴克图村建立了依密勒指挥部，负责塔城一带秘密活动。在他安排下，塔城各“战斗小组”合并组成“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组织。

1944年9月，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尔克孜族，在苏境内筹建“蒲犁解放组织”和蒲犁游击队，命努尔阿吉等率蒲犁游击队，从苏联越境攻打蒲犁县。

在这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时，指责盛世才制造蒙中边界冲突，表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是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措施。这种指责全系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当时的新疆，由于盛世才一再制造“阴谋暴动案”，关押并杀害了许多政敌，也关押并杀害了各民族的一些上层分子、富商，因而激化了民族矛盾；为了偿还苏联贷款和满足来新苏方人员待遇，又必然加重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盛世才投靠中央政府后，为了表示他的忠诚，决定新疆捐献军马一万匹，这更激化了同伊、塔、阿三区牧民的矛盾。1944年9月，盛世才被免职，调离新疆，朱绍良、吴忠信主政新疆，出现了磨合期的“有效权力空隙”：朱、吴刚入新疆，对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复杂性估计不足而应对失当；原属盛世才控制的新疆军队，分驻各地，群龙无首，人心浮动，士气低落；刚入新疆的国民党军队，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这种状况，正好被苏联所利用。

苏联在整个苏新边境地区的活动，显然有一个高级决策机构在谋划、指挥。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首先攻打阿山地区，吸引迪化驻军主力，然后夺取伊犁。

1944年6月初，在苏联留学的哈萨克民族上层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和铁木尔汗、阿热甫拜等13名苏联顾问（“白房子顾问组”）取道外蒙古到阿山游击队营地，参加领导指挥。在这前后，布尔津、福海、哈巴河、吉木乃、和丰各县都建立了游击队，许多苏军、外蒙古军人在游击队中作战。10月，“阿山革命临时政府”在青河县布尔根河成立，乌斯满任政府首脑，达列力汗任政府副首脑兼军事总指挥，将阿山游击队整编成为九个大队，在苏联、外蒙军事顾问的帮助下，攻打承化寺（今阿勒泰市）。果然，朱绍良调集近五千名军队，配备飞机、大炮、坦克，向阿山开进，以解承化之危。

接着，制造“伊宁事变”，夺取伊宁及整个伊犁地区。为此，苏联人又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先夺取巩哈（尼勒克），吸引伊宁驻军，然后乘虚攻占伊宁。

早在1944年8月，苏联侨民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组织巩哈游击队，发起“巩哈暴动”。10月7日，游击队攻占巩哈县城。伊宁驻军主力1600人调往巩哈平乱。苏联侨民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在果子沟组织游击队，形成战略呼应。11月初，苏驻伊宁领事馆认为伊宁暴动条件成熟，一面派人向苏联求援，一面调巩哈游击队攻打伊宁，同时在城内发动和武装群众。11月6日苏联军官阿列克山德洛夫率一支军队从霍尔果斯潜入伊宁，同“伊宁解放组织”组成军事指挥部，阿列克山德洛夫为负责人。同日，列斯肯袭击芦草沟区派出所，占领芦草沟，切断迪伊公路。当晚巩哈游击队三个大队到达伊宁城郊待命。11月7日，伊宁暴动开始，外有巩哈游击

队进攻，内有苏军和武装人员呼应，驻军中少数民族士兵哗变。11月9日伊宁驻军负责人曹日灵，电告朱绍良内有：“名为剿匪，实为国际战争”。“市区土匪全为归化人及塔塔尔族，以其领事馆作根据地，所获武器系苏联制造”。10日，伊宁全城被攻占，守军残部及各地逃来的汉族官员、群众约8000多人，撤至城郊飞机场及艾林巴克、鬼王庙两处高地，固守待援。此为“伊宁事变”。

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在维、哈、柯俱乐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东土国政府”），其政府成员绝大多数为宗教上层、民族上层、富商、大地主、牧主及苏籍侨民。苏联军官阿列克山德洛夫任游击队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各地作战的所有武装力量。11月16日，穆努诺夫和苏联军官亚历山大、伊万·雅可夫列维奇·颇里诺夫率一个营骑兵，从苏联来伊宁参加围攻艾林巴克的战斗。11月下旬，以符拉基米尔·柯兹洛夫为首和以符拉基米尔·斯特潘诺维奇为首的两个苏联顾问团，对外称“一号房子”、“二号房子”，来到伊宁。同时入境的还有苏联作战、情报、通讯等技术兵种军官，分散到各部队担任要职。柯兹洛夫，格鲁吉亚人，苏军中将；斯特潘诺维奇，50多岁，贝利亚派来的代表，对外称“二号房子”，权力极大，他的决定是最后决定，必须执行。

新疆军政当局仓促制订了“五路围剿”的作战计划，在气候严寒、地广人稀的新疆，根本无法实现。其中一路沿迪伊公路西进，受阻于果子沟，面对冰雪筑成的路障，坦克、战车无法逾越，又受不断狙击，只得退兵。另一路谢义锋率一个团，从精河出发，攻占科尔古琴达坂，经过一天战斗，抵达皮青里山沟，距伊宁飞机场只有20公里，灯光都看到了。第二天早晨，正煮早饭，突遭游击队炮击，炸断郑副团长的手，运送给养的后勤人员误入游击队营地，粮食弹药全被夺走。气候严寒，雪深没膝，粮弹告罄，谢义锋权衡再三，下令撤退，一千多人返回精河。（我院退休医师曹振海先生，时任该团卫生队长，上述内容，他面告笔者。）谢义锋部作战的枪声，困守艾林巴克的孤军都听到了，曾寄予很大希望。担任总司令的阿列克山德洛夫也听到了，带着抢来的一车财物准备逃跑。为此，改由颇里诺夫任总指挥官。颇里诺夫本是白俄军官，沙俄驻伊宁马队队长，十月革命后留居伊宁。1938年被盛世才拘押，苏联引渡回国。颇里诺夫久住伊宁，熟悉地理、环境、民情，在他和苏联顾问指挥下，以训练有素的苏军为骨干，配以重迫击炮、烧夷弹的轰击，经过80多天的长期围攻，1945年2月1日，攻占艾林巴克。伊犁地区各县政府官员，没有军队保护的，闻风而逃；有军队驻扎的，均发生激烈战斗。绥定县城久攻不下，一支苏联工兵炸塌城墙，才攻占该城。

1945年6月初，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民族军总指挥部制订了北、中、南三线作战计划。颇里诺夫率军进攻塔城，7月31日占领塔城，肉孜耶夫的依密勒指挥部解散，带了一批苏联顾问到塔城做官。9月上旬，攻占阿山地区，北线战斗结束。中线军队沿伊（犁）迪（化）路东进。9月4-8日，颇里诺夫在苏军支援下，出动三架飞机，并有装甲车、炮兵配合作战，经过激战，攻占重镇乌苏。9月5-8日，穆努诺夫在苏军帮助下，攻占重镇精河，中线民族军一直推进到玛纳斯河。南线战斗在蒲犁、拜城、阿克苏、温宿等地展开。苏新边界形同虚设，苏军和各种武器装备可以任意进出，战火燃烧在整个苏新边境。由于苏联入侵造成的新疆局势极其危急！

四、

1944年11月7日，伊宁暴动开始，11月12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这两个日子耐人寻味。前者透露了“伊宁事变”同苏联的关系；后者是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日子，挑选这个日子建国，表明分裂中国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苏联为了制造这个“东土国”，到底出动了多少军队、顾问、教官、专家，恐怕已经无法说清。进入新疆作战的军队，至少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出动了飞机、装甲车、山炮、轻

重迫击炮、高射机枪等，其中一次战斗中有使用山炮、轻重迫击炮百余门的记载。发生在伊犁、塔城、阿山和南疆的任何战斗，都有苏联顾问和苏军参加。苏联一手扶植的泛伊斯兰主义分子艾力汗·吐烈，既是“东土国”政府主席，又是统揽军事指挥大权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被授予“元帅”军衔。他身边的苏联顾问莫合森，如影随形。真正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是在伊宁的“二号房子”，斯特潘诺维奇，他的上司是坐镇阿拉木图的特务头子贝利亚，然后通向苏联领导核心莫洛托夫、斯大林。艾力汗·吐烈和颇里诺夫是实施侵略的文武两个打手。

1945年1月5日，“东土国”政府公布“九项宣言”，宣称“在东土耳其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解放的共和国”。艾力汗·吐烈到处发表分裂中国的演说，把“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斥为“谬论”，宣称“东土耳其斯坦是我们的祖国”。在民族军成立大会上，他煽动分裂中国，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情绪，授予各部队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前进”口号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在军队中派驻神职人员，团设宗教副团长，连设专职阿訇，主持士兵日常宗教活动，负责以“圣战”精神鼓励士兵为真主而战，为消灭“异教徒”而战。“东土国”政府设宗教事务厅，直接领导宗教法庭，独立行使审判职能。伊宁设最高宗教法庭，每县建立宗教法庭。宗教法庭全部由“法孜”（宗教法官）组成，设有庭长、审判员、法警。宗教法庭不仅有审判权，兼有公安机关逮捕人的职能。宗教法庭实行一审判决，所判案件，当事人没有辩护权和上诉权，审判的法律依据是“沙里亚”（伊斯兰教教法）。同时，从1944年起开征“吾守尔”（什一税）、“扎卡提”（课）。1947年11月18日，阿山专区宗教人士的代表大会“决定”中，竟有“对惨无人道的罪犯，可给予枪毙、吊死、砍掉一只手和一条腿、流放等惩罚”。这些人居然提倡如此野蛮的惩罚，其落后反动，读者应十分清楚了！

早在“伊宁事变”酝酿阶段，艾力汗·吐烈一类反动分子就煽动反汉排汉。“东土国”成立后，出现了惨不忍书的民族仇杀。人人皆知、史家忌书的一个血腥口号叫“杀回灭汉”。东北籍汉人（盛世才是东北人）几乎杀光。许多善良的维吾尔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汉人藏在自己家里。张治中先生1946年8月28日至9月4日亲临伊宁，他记述道：“三区汉人被杀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杀光了”。必须指出，进行民族仇杀的不仅仅是个别极端分子行为，同“东土国”政府的反动政策有关。1945年5月，“东土国”政府命令各县汉族群众到各县公安局集中，然后将东五县（昭苏、特克斯、巩留、新源、巩哈）的千余名汉族群众集中到宁西县，将西四县（伊宁、绥定、霍尔果斯、宁西）的两千多名汉族群众集中到惠远。8月6日“东土国”政府财政厅、土地水利厅联合决定，由土地水利厅负责监督收割伊犁各县汉族群众地里的庄稼。各县可将原汉族群众土地中的菜地和果园作价出售，其余土地可承包给私人。这种政策，令人想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

汉人过着鱼游釜底的日子，其他各族劳动人民同样被套上了枷锁：当时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总人口才70多万人，基本上经济落后的农牧区。持续的战争，大批的苏联军政人员，庞大的军队，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艾力汗·吐烈的第一项“外事活动”，是写信给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要求解决武器弹药，将用人民捐献的财物或牲畜交换。艾力汗·吐烈的第一次“外事交涉”，是写信给苏联驻伊宁领事：求苏联政府严肃处理苏联边卡上擅自收购特克斯、昭苏等县农牧民被盗牲畜的人员，制止此类事情的继续发生。因为战争需要，规定年满18岁-45岁的男性公民都要服兵役，原则上一户留一个劳动力；征用私人汽车、油料、工具、材料，以保证军事物资供应，企图藏匿者按军法制裁；规定各级政府按原来管理范围征收赋税。新增的税目除“吾守尔”、“扎卡提”等宗教税外，还有按牲畜总数的3%-5%征收“青草税”（1945年4月10日命令），印花税（7月26日决定）。1946年1月12日“东土国”政府通过决议，征收的税种为营业税、工业税、贩运税、活畜税、牧业税、屠宰税、木材税、粮食税、土地税、包裹税、

邮税、运输税、煤炭开采税、影剧院营业税、执照税、海关税、盐税、烟酒税共 18 种。加上前面已述税种，达 20 多种。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逼债之凶暴严酷。1945 年 3 月 18 日，“东土国”政府决议：在 4 月 16 日以前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者（按：原中国政府贷款），银行除扣除利息外，还要按利息的 16% -75% 罚款；至 4 月 20 日不能还清贷款的，银行除扣除利息外，还要按利息的 100% 罚款。自 4 月 21 日起，仍不能还清贷款的，除扣除利息罚款外，还要给予行政处罚。同年 4 月 2 日又决定，由财政厅负责清查原中国政府统治时期人们所欠银行的帐目，限欠款人在 28 日内还清，过期不还，按日罚款，有钱交钱，无钱交物。1946 年 3 月 3 日，“东土国”政府通过决议：决定要认真回收 1944 年中国统治时期的“采买粮”（预购粮）和征收 1944 年、1945 年公粮。一次逼缴这么多欠粮，农民还怎能活命？

“东土国”政府把县、区、乡、村的官员恢复清代总管、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的名称（总管后改县长）。1945 年 4 月 1 日，阿山专署决定：对各民族中原有的王公、贝子、台吉、乌库尔台、扎楞、藏根等部落首领的封建封号和地位应予以保持，并在哈萨克、蒙古、俄罗斯族的头目中重新封了一批封建爵号。部落首领可以跨地区征收“血亲税”（骨头税），管理各自的部落民众。

在整个“伊宁事变”和“东土国”政府文件之中，没有一条反映农牧民利益的口号、政策、法令，没有减轻农民地租负担、改善农牧民地位的举措。相反，“东土国”政府 1945 年 9 月 15 日决定：“乌苏、精河二县可将公有和无主土地在愿向政府交 2/3 收成的前提下，鼓励私人来耕种”。这个决定表明，交纳收成的 2/3 是一种优惠，则当时的农民赋税负担当在 2/3 以上。可见“东土国”政府的横征暴敛之酷，连秦始皇的“泰半之赋”，也远远不如了！

无休止的征兵、征物、征税、征粮、逼债，沉重的宗教压迫、封建压迫、民族压迫，对各族劳动人民来说，不是什么自由、平等、解放，而是陷入苦难的深渊！即令这样敲骨吸髓地搜括，仍无法满足浩大的军政开支，剩下的只有滥发纸币，不断地发行公债，当然那无异于饮鸩止渴！

“东土国”对那些反动的宗教上层、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来说，的确是天堂。他们依仗苏联势力，加官进爵，授勋晋升。1946 年 6 月 1 日，“东土国”政府通过决议，授予艾尼·帕提赫·莫斯里莫夫二人“人民英雄”称号。这两人都是巩哈暴动的首难者，攻打巩哈、伊宁的功臣。但这两人的人品，却是乏善可陈。据陶天白先生（时任张治中将军私人秘书）介绍说：艾尼是个大力士，能隔墙掷牛。他是个盗贼，曾被盛世才捕押，越狱后，参加巩哈游击队，后因功被授予中将军衔。艾尼又是个淫棍，家中妻妾达 30 多人，原宁西县警察局长颜秉河之妻，即其中之一；社会上还有姘妇 40 多人。解放后因调戏宾馆女服务员，曾被王震司令员训斥。1951 年 6 月 22 日《新疆日报》刊有群众控诉他的文章。帕提赫（法提合），苏籍侨民，“伊宁事变”后任巩哈县长，利用职权，聚敛财富。他的财产超过原有的数千倍。1951 年 7 月 12 日《新疆日报》《法提合在新疆的罪行》。这两位“人民英雄”，实乃人渣，无法在新疆立足，不得不迁居苏联。

十分明显，苏联当局勾结新疆反动势力，用枪炮制造出来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是分裂中国的、政教合一的充满着严重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封建反动政权，其本质同沙比提大毛拉的政权一样，只是后台不同，前者是英国人，后者是苏联人。但危害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则大大超过前者。以至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苏联的军事入侵，说成“援助”，一些文献仍把苏联策动“伊宁事变”，说成“人民起义”，把“东土国”说成“革命政权”。绝不容许用“主流”、“支流”，“既有”、“也有”，“主观”、“客观”进行辩解。每位中华儿女必须明白，无论何人，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无论出于何因，一旦背叛了祖国，那就一笔勾销了自己。难道有不要祖国，背叛祖国，仇视祖国的“革命”吗？对分裂祖国的行为，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是不允许保留任何空间的。维护国家统一是最高民族利益。“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从纲领到行动，从内容到形式，从动机到效果，都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物。对这样罪恶昭彰的历史罪行不揭露、不谴责、不否定，岂不是放弃历史学鉴戒后人的功能吗？岂不是对现实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纵容吗？

五、

二十世纪前半期，世界各国的进步青年，朝圣般地去苏联学习。他们把苏联神圣化，把斯大林神圣化。苏联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当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时，一些中国留学生竟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荒唐口号。在苏联制造“伊宁事变”过程中，也有一部分新疆热血青年参与其中。

阿巴索夫参加了“伊宁解放组织”，接来了阿列克山德洛夫带领的苏军，担任了“东土国”政府委员兼内务厅厅长。但他反对分裂祖国和仇杀汉族群众，下令内务厅工作人员制止此类事情发生。他和夫人吕素新亲自把一些汉族群众接到自己家里加以保护，为此，“一度受压抑”（邓力群语）。23岁的阿巴索夫孤掌难鸣，无法抗衡苏联的力量。

阿合买提江 1942 年 6 月从苏联留学回来，1943 年 12 月被盛世才逮捕入狱，1944 年 10 月由吴忠信释放。包尔汉先生说：“在伊宁起义的日子里，可以看到他穿一件破旧的大衣，腰系线绳，到处忙碌，一会在厨房，一会儿又出现在医院和战场。其时，他的身份是提水烧饭的伙夫”。“在和平谈判之前，新疆乃至伊宁市人民，对他的名字还是陌生的”。

尽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签订，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苏联在新疆的军事行动却不断升级。美国提出了苏联在新疆的军事存在。苏联当局权衡利弊，决定改变对新疆的侵略方针。这样，便出现了张治中先生与三区和平代表的谈判。

阿合买提江等三位和谈代表，身穿草绿军装，配月星肩章和月星勋章，佩带“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证章，并要求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代表的身份与中国政府谈判。张治中果断表示：我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接见事变分子的代表，不能接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的代表。经苏驻迪化领事疏解，改用“人民代表”身份同张治中谈判。

阿合买提江的政治才能是在谈判过程中显现的，他的政治主张也是在谈判中逐渐鲜明起来的。他强烈反对民族仇杀，但对分裂行为的严重性是逐渐认识的。张治中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立场、平等友好的态度与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对他也是有感悟和启示的。事实上他起着“首席代表”的作用，依靠智慧和坚定的原则性，排除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民族分裂分子的严重干扰，表达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真正心声，在伊宁和迪化之间奔波六次，时间长达八个月。1946 年 6 月 6 日，和平谈判结束，《和平条款》正式签字。阿合买提江成为新疆政坛一颗耀眼的新星，伊宁各界公认的领袖性人物。

1946 年 6 月 18 日，国民政府发布政令，宣布改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任副主席。6 月中旬，苏联撤回了艾力汗·吐烈、阿合买提阿吉·热依木江、玉山卡里等为首的一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以及代号为“一号房子”、“二号房子”的苏联顾问团，伊宁政府各厅局的苏联顾问，民族军总指挥颇里诺夫，塔城副专员肉孜耶夫。在这以前的 1945 年 12 月，因国民政府要求，国际代表团来新疆考察“阿山事件”真相，苏联匆忙撤出了阿山总顾问铁木尔汗、副总顾问艾力汗，阿山副专员阿热甫拜，在阿山各处局任职的苏联顾问和阿山骑兵三团的苏联军事人员，真是做贼心虚！6 月 27 日，成立近 20 个月，连苏联自己也不敢承认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解散，改组成“伊犁专区参议会”，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任民族军总指挥。伊犁、塔城、阿山三地区及民族军指挥权，才回到中国人手中。

1946 年 7 月 1 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迪化召开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和平大会，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伊宁方面八人发表《告全疆各族人民书》：“今年 6 月 28 日，我们宣布在伊、塔、阿专区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3 个专区分别直接归属于省联合政府，按照所签订的《和平条款》，全省人民得到了我省前所未有的最大权利”。7 月 16 日，阿合买提江在维吾尔族群众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的运动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反对一个民族统治一个民族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得其他民族一律共同生存、共同

发展的权利。所以我们今日的革命，就是民族解放革命”。8月22日，阿合买提江在省联合政府委员座谈会上提出：“东土耳其斯坦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不能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如果有人拿来作政治活动的理论，就是省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敌人”。他动情地说：“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区是新疆的组成部分。伊犁是我呱呱坠地的地方，是埋葬我们祖先的地方，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所要求的是解放、自由和平等”。同时，他开始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从而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反动思潮划清了界线。

但是，长期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宣传和苏联反动宣传，已造成严重影响。“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虽已解散，阴魂仍然不散。“东土国”机关报《东土耳其斯坦报》改为伊犁专署机关报，维文版改名为《革命的东土耳其斯坦报》。1946年11月，阿合买提江等新疆代表33人，到南京出席国民大会，阿合买提江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期间，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7名代表，向大会提交了《请在中华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予高度自治》的提案。国民政府派邵力子等人和阿合买提江等人就此事长谈多次，蒋介石多次召见，就新疆有关问题及其前途进行了专门谈话。在南京方面的疏解劝导下，阿合买提江等自动撤回了提案。

阿巴索夫是林基路的学生，思想进步。1946年5月5日在伊犁成立秘密革命组织人民革命党，阿巴索夫被选为主席。当年6月下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11月7日在迪化秘密成立的进步组织）李泰玉、陈锡华与阿巴索夫取得联系。这是迪化和伊宁革命者之间的首次联系。1946年12月5日晚，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的阿巴索夫，到梅园中共办事处谒见董必武，表达了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疆人民对毛泽东、朱德的敬意，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信件，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一些具体要求。董必武当夜电告党中央。第二天收到了党中央由周恩来草拟、刘少奇签发的复电。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谒见董必武，董必武传达了中央批示精神，决定派彭长贵带一部电台随阿巴索夫进疆。1947年1月14日，阿巴索夫与彭长贵携带中共“七大”文件、毛泽东、刘少奇著作及一部电台随国大代表回到迪化（因电台功率不足，未能建立联系）。2月3日，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人民革命党根据中共建议合并组成社会革命党，主席阿巴索夫、副主席李泰玉、艾斯海儿·伊斯哈科夫，中央委员有赛福鼎·艾则孜、罗志等人。《民主革命党章程》中党的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为了避免使群众特别是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成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而向他们进行教育，用党的理论武装他们”。阿巴索夫是伊宁方面领导人中第一个主动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人。

直至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三区代表撤回伊宁，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才有时间和精力整顿和巩固内部。从政治理论、方针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阐发和总结。伊宁曾是艾力汗·吐烈之流长期进行泛伊斯兰讲义、泛突厥主义反动思想宣传的老窝，苏联策划分裂中国的中心，现在发生了根本变化，变成了同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坚强阵地，反对分裂中国的战斗堡垒。1948年8月1日，集合了新疆一切进步力量的政治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在伊宁成立，阿合买提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新盟”使用新疆这一传统的合法的地名，是对新疆内部分裂势力的明确否定，是对苏联长期进行的反动宣传的明确否定，是三区斗争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里程碑。

正是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优秀领导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驱散了伊宁上空的乌云，重申了斗争的目标是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争取政治民主、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远处西陲的伊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三区领导人却采用多种形式介绍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译载毛泽东、刘少奇著作，在民族军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手册》，千方百计地把三区的斗争融入全国人民革命的大潮之中。1949年5月11日，阿巴索夫在第一次新

盟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说：“事实证明，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不仅在其特点、方向及其任务方面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一致，而且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或中国民族问题得到彻底和正确解决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唯有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获得最后胜利时，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和正确的解决，新疆人民的前途，才是光明的”。5月25日，阿合买提江在新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汉文）上撰文说：“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有过把所有汉族都当作敌人的看法。其结果，我们没有分清朋友和敌人，而把全体汉族人一样对待，其中把朋友也打了，却保护了那些比反动的国民党官吏更凶恶的民族败类。结果，把我们民族解放运动的同盟者汉族人民推到敌人那边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政策”。“目前的任务是急速纠正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第一阶段中所产生的错误，建立不分民族的、在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势力影响的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的新民主的新省份”。尽管伊宁仍有代号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二办公室”的苏联顾问团（1947年8月底-1949年8月初），但其性质和作用同“二号房子”有根本区别。

在没有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又受苏联严重影响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反动思想包围的条件下，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领导人，以他们的远见卓识，无畏胆略和求实精神，扭转了三区的斗争方向，并使他们的斗争成为新疆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毛泽东给予重要评价：“你们多年的奋斗，是我们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当然，三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仍然是两个天地，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46年6月底，“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解散，三区的斗争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个转折经历了艰难而深刻的过程。1948年8月1日“新疆保卫和民主同盟”的成立，标志着这个转折的完成。从这时候起，把三区的斗争称为“三区革命”，才是名副其实的。

参加这一历史事件的人，相当大的一部分追随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走上革命道路，有的经过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疆历史上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但有的坚持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反动立场，只得悄然移居国外；也有的野心膨胀，成为历史罪人，自取灭亡。大浪淘沙，渣滓随浊流而去，令人感慨但无须惋惜，精华则闪耀于史册，永为后人怀念。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2]王斯德主编,世界现代史参考资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 [3]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4]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M].北京:文献资料出版社,1985.
- [5]包尔汉,新疆五十年[M].北京:文献资料出版社,1984.
- [6]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 [7]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 [8]马品彦,正确阐述新疆伊斯兰教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 [9]陶天白,沙原寸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 [10]陶天白,天山鳞迹[M].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